

中国古代的

权臣

可遇不可求的权臣

权臣的徽记

登上权臣地位的阶梯

权臣的左右手

神圣的光环

偏见——沉重的十字架

诱人的歧途

再也没有权臣

江建忠 著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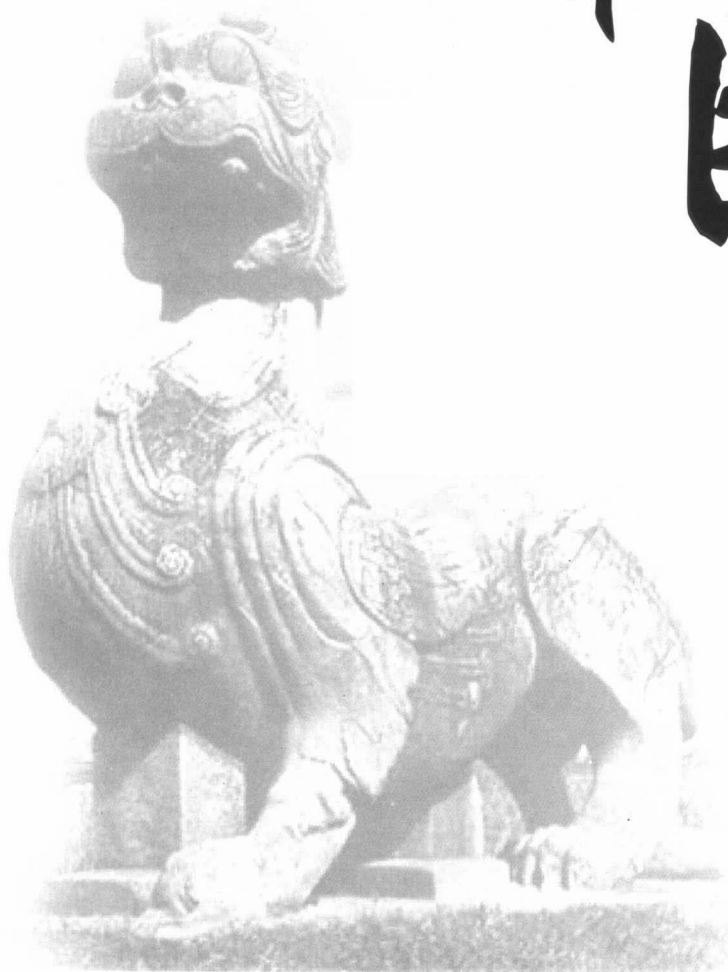
上海古籍出版社

中国
古代的

权臣

江建忠
著

上海古籍出版社



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中国古代的权臣/江建忠著. —上海:上海古籍出版社,
2007.4

ISBN 978-7-5325-4593-3

I. 中... II. 江... III. 大臣—人物研究—中国—
古代 IV. K827=2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(2006)第 158762 号

中国古代的权臣

江建忠 著

上海世纪出版股份有限公司 出版、发行
上海古籍出版社

(上海瑞金二路 272 号 邮政编码 200020)

(1) 网址: www.guji.com.cn

(2) E-mail: guji1@guji.com.cn

(3) 易文网网址: www.ewen.cc

赢来书店 上海发行所发行经销 上海商务联西印刷有限公司印刷

开本 635×965 1/16 印张 12.5 插页 3 字数 168,000

2007 年 4 月第 1 版 2007 年 4 月第 1 次印刷

印数: 1-4,300

ISBN 978-7-5325-4593-3

定价: 24.00 元

如发生质量问题,读者可向工厂调换

前 言

权臣可以说是一种历史现象。

零星散见于某些朝代的作为个体存在的被称之为权臣的人物，从来就没有构成过一个社会群体，甚至连社会层面都称不上。但是，这种特殊历史现象，千百年来不知惊扰过多少英主贤臣、贞人志士的梦魂，留给史家论者多少迷惘、困惑。

最早出现权臣这个词汇，是在《晏子》这部先秦的著作中。而后，生活在权臣人物频繁出现的六朝时代的大史学家范晔，在他所撰编的史学巨著《后汉书》中，试图对权臣作出政治漫画式的描述：“权臣放纵，矫称诏制。”这幅权臣图像，绝对不是全面的，但却也呈现了某些权臣行为的真实。只不过正统的封建史家，出于维护圣君贤主的忠肝义胆，抑制不住对任何有损于帝王家的行为的愤慨，对堂堂正正的皇家史事里出现的“非常人”所行的“非常事”的认识，打从一开始就不自觉地走入误区。

作为帝王们学习统治术的教科书——《资治通鉴》，对权臣的人与事，乃至一言一行，都不厌其烦地仔细搜罗、纪录，再配上元人胡三省的解释，把对权臣的警惕、鞭挞，发挥得淋漓尽致。这对帝王们的佐治之勋，真可谓是莫此大焉！对愿意冷静地研究、评论历史上权臣现象的

后人说来，倒也同样功不可没！

到了现代，人们对权臣现象的认识，逐渐摆脱正统史家的偏执的影响，更多地注视历史人物行为的得失和相互间的类比，普遍对权臣趋于宽容。同时，人们发现，可以归入权臣行列的历史人物，似乎变得多了起来。这恐怕要归咎于过分地专注于“权”这个特定商标的缘故。于是乎，妇孺皆知的贤相诸葛亮首先戴上权臣的帽子，挤入了曹操行列；明朝那位神宗皇帝的老师、内阁首席宰辅张居正，也推推搡搡地被拉入权臣的席位。此外，正史中形形色色的佞臣、奸臣，只要“权势薰天”、残害忠良、祸国殃民，都一一标上权臣的徽记。人们观察权臣现象的视野陡然变得空前开阔起来。

看来中国古代史上权臣现象这一课题，有待更多对此感兴趣的史学工作者加以深入研究，才能逐步廓清。而这本小册子只想把问题提出来，并试图先把“狭义的权臣”从广义的权臣中“界定”出来；用比较多的史实，通俗地说明权臣现象不是无限制地反复出现，而是在特定历史条件下，可遇不可求地介入历史，以求清理出权臣的生成、发展、最终归于消泯的轨迹。如果真能达到这个微末的目的，那将是笔者的莫大荣幸。

作 者

目录

前言 / 1

可遇不可求的权臣 / 1

权臣的徽记 / 4

 绝伦的高位 / 4

 无上的军权 / 9

 成功的废立 / 12

 超俗的使命 / 18

登上权臣地位的阶梯 / 24

 朝官大臣的非常扩张 / 24

 外镇边将的夤缘入据 / 30

权臣的左右手 / 34

 “同气相求”的谋士 / 34

 难以出头的武将 / 39

 过分的热情 / 42

神圣的光环 / 45

 金滕前的周公 / 46

 执政后的霍光 / 49

 死而后已的诸葛亮 / 54

王茂弘的“为门户计” / 56

偏见——沉重的十字架 / 62

“宁我负人”的曹操 / 63

“遗臭万年”的桓温 / 67

诱人的歧途 / 73

王莽所开的先河 / 73

征西将军墓志 / 84

司马昭之心 / 94

勉强跨过一步的王大将军 / 106

畏缩不前的运甓公 / 114

棋差一着的庾氏兄弟 / 124

求九锡的疑案 / 133

祁连池上的乐声 / 145

姑且立一个皇帝 / 160

大诛杀而后定的隋文帝 / 172

再也没有权臣 / 182

秦皇汉武的隐忧 / 182

伟大的唐宗宋祖 / 185

皇权永远会迷失 / 193

斗大江山，经几度，兴亡事业。

瞥眼处，英雄成败，底须重说。

——明·吴易

可遇不可求的权臣

世上有些事物是可遇而不可求的，权臣就是这样。

在漫长的中国封建时代里，什么样的名位都可以通过追求而得到，什么样的名位也都有人追求过：

战国时的苏秦，一心追求“卿相之尊”，锥股血踵，发愤揣摩太公《阴符》，终于身佩六国相印；吕不韦以阳翟商贾的身份，为追求“无数”倍之利，不惜以千金、美女，押宝在异国人质的身上，终于取得富可敌国、位极人臣的丞相高位；书生班超，渴望“飞而食肉”、万里封侯，不甘心于刀笔吏的碌碌生涯，投笔从戎，历尽艰辛，遂就了封侯拜爵的心愿；一介寒士吕蒙正，通过科举，在仕途上直攀到参知政事的名位。^[1]

甚至连“皇帝”这样的神圣至尊之位，也有人追求，居然也屡屡有人追求成功。秦始皇出巡，亡命江湖的落魄贵胄项羽和猥为亭长的刘邦，分别都为皇帝的至尊荣耀所吸引。前者说“彼可取而代之”，后者则认为“大丈夫正应该如此”。后来一个成为大汉开国君主，一个成为一度号令天下的“西楚霸王”。

至于一心觊觎皇位，搏命于“逐鹿中原”的皇位游戏者，更是大有人在。

汉朝初建，大汉高祖皇帝刘邦的宝座尚未坐热，功臣猛将一个接一个地“叛乱”。贵为淮南王，拥有九江、庐江、衡山、豫章四个大郡的英布，原是个黥徒（因犯法而刺字面上，去服苦役的刑徒）出身的“群盗”，当功劳和他相埒的彭越、韩信相继被诛杀之后，也据地造反了。刘邦亲自带兵前去镇压。两军阵前，刘邦对英布说：“你又何苦要造反呢？”英布干脆地回答说：“想当皇帝！”^[2]

英布最后身败国灭，没有当成皇帝。可是，后世的王莽、孙权、刘备、刘渊、石勒、苻坚、刘裕、萧衍、杨坚、李渊、赵匡胤、朱元璋等一个个野心勃勃的乱世英雄，无不是竭尽心智，刀光剑影地“逐鹿”一番之后，如愿以偿地登上皇位的。

还有一种追求。

帝王将相、大小官吏，出自某种原因而策励自己，孜孜努力要成为名臣、良将，乃至贤明天子；诸葛亮躬耕陇亩，自比管仲、乐毅，辅佐蜀汉，“鞠躬尽瘁，死而后已”，成为名垂千古的贤相；土豪周处，横行乡里，名列“三害”，后来折节励志，成为一个刚正一时的御史中丞，最后堂堂正正地殁于王事；^[3]唐太宗李世民，靠弑兄逼父取得帝位，但又强抑私欲，纳谏从善，终于成为明君英主的典型；大名鼎鼎的文天祥，独力支撑南宋半壁江山，不惜喋血柴市，用一片丹心证明自己是坚贞不贰的忠臣。这些事例，说明存在着这样一种追求，而且也是可以经过努力而实现的。

唯独权臣，历史上没有一个人物以此作为自己的追求目的。

不仅因为权臣这个词，在传统观念中并不是个褒义词，更重要的是，权臣实际上是一种微妙的历史选择，是一种难以捉摸的特殊境界。这种名位，看来仿佛也可以一步一步攀登而至，但一旦接近了它，有时它会飘忽到一边去，教你把握不住，很有点“瞻之在前，忽焉其后”的意味。遇合者往往会感到，这里容不得半点退缩，也来不得半点超越，稍有失措，历史就匆匆地翻到另一页去了。

当历史的暗潮，有意无意把某个人物推向权臣这个特殊境界时，往

往或出于本人思想意识的障碍，或出于某种政治力量的干扰，中途停滞下来了，这个人物就成不了权臣，而只会流为一般意义的大臣。或者虽然没有上述的那种障碍和干扰，而本人却过于热衷，同样不能在这个特殊的境界上定位，这个人物还是成不了权臣，也许就此成为某个王朝的开国英主。而这两者都不是我们所要说的狭义上的权臣。

然而，历史上确实有过那么一批人物，他与某种历史机缘相契合了，定位在这种特殊的境界。尽管有时甚至是违背了本人的意愿，但是历史的力量，使他们无可奈何地成为这种境界的陈列品，在历史的巨大橱窗中，让古往今来的人们，这样或那样地议论着。这就为本书提供了向读者阐述自己看法的机会。

注释

[1] 宋太宗太平兴国八年(983)以吕蒙正为参知政事。宋制参知政事为执政，相当于副相，一般都由名闻天下的大臣充任。

[2] 《史记》卷九十一《黥布列传》。

[3] 《晋书》卷五十八《周处传》：“处自知为人所恶，乃慨然有改励之志，谓父老曰：‘今时和岁事，何苦而不乐耶？’父老叹曰：‘三害未除，何乐之有！’处曰：‘何谓也？’答曰：‘南山白额猛兽，长桥下蛟，并子为三矣。’”

据器而道存，离器而道毁。

——清·王夫之

权臣的徽记

一般地说，“权侔人主”的大臣比比皆是。打开一部二十四史，哪一个朝代都有那么几个蠢蠢逼人的大臣，玩弄权柄，操擅朝政，风风雨雨地闹得朝野怨望，七庙危殆。但是，仔细分析之下，这些权倾朝野的大臣，不一定就是上述那种定位于微妙特殊境界的权臣。狭义上的权臣，应该有其独特的徽记。

绝伦的高位

专制主义下的皇帝，总自认为“朕即国家”，拥有绝对的至高无上的权力。但这是后来的事，在统一的封建主义国家出现的初期并不如此。丞相作为“天子副贰”，在当时的政治体制中，对皇帝既有作为臣下的隶属性，又有作为天子助手的实权。丞相总揆百官，下理万民，拥有施行行政权力的府署，足以抗衡、抑制君主的行动。这是与皇帝的本意迥然相违的。

第一个把皇帝的称号加在自己身上的秦始皇帝，也是第一个感觉到丞相权位对自己障碍和威胁的人。

这个把六国故宫都仿制在咸阳，把万余名美女充陈在后宫，一心要享尽天下乐事的独夫，竟然“躬操文墨，昼断狱，夜理书，自程决事”，一天要披阅一百斤重的竹简文书。很难想象，一个享乐至上的秦始皇帝会把如此烦重的“超级劳役”视作自己的一大享受；古往今来的史家们以“勤于国家”来解释，也扞格难通。其实很简单，这仅是一个把九州六合视作一家私产，想使它传之万世的皇帝，对丞相猜忌防范心理的直接反映。只不过，这位“千古一帝”头脑简单，手法笨拙，才这样蛮干。



秦始皇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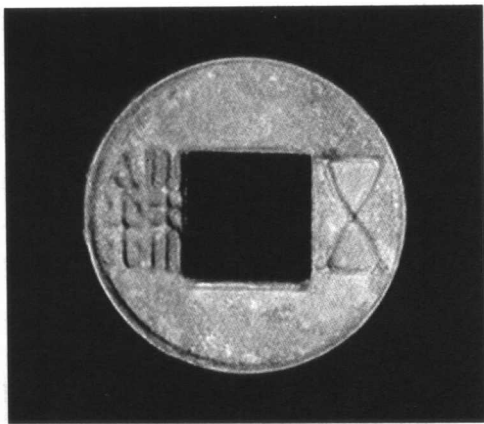
另一位常与秦始皇一起被人相提并论的汉武帝，就高明得多了。这位史称“多欲”，而又雄心勃勃的汉帝，一登帝位，就被汉初那种所谓“屈君伸臣”的局面所困扰。这位信奉由朕一人进行专制统治的雄



汉武帝

主，首先就以频繁罢相的手段，来显示自己的权威、削弱丞相的地位。接着又从外戚丞相田蚡手中，分得本来掌握在丞相手中的官吏任用权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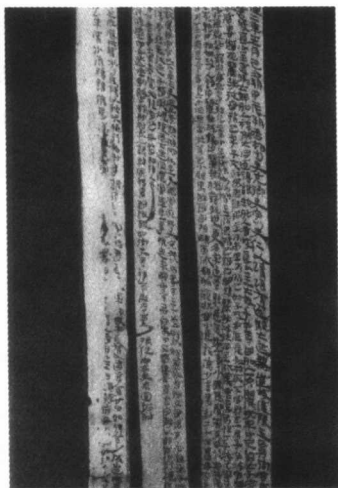
同时，这位敢作敢为的汉武帝，大量征任属于皇帝近侍的郎官和大夫，逐渐形成与原由丞相系统政务官为核心的“朝廷”有别的“内廷”。用“加官”的方式，让原本品位卑小的郎官、大夫等内朝官，再加上“侍中”、“给事中”等头衔，得以在皇帝



汉“五铢”钱

身边参与国事机要。而得不到加官的外朝官，则被排斥在机要之外，变成单纯的奉诏行事的行政官员。

同时，汉武帝又把原来属于少府署，处理文书的尚书，通过加官的形式，从朝廷公卿的管辖下分离出来，变成皇帝与丞相的中介。臣下的奏章，先通过尚书进呈皇帝，然后又再由尚书下达给丞相。而皇帝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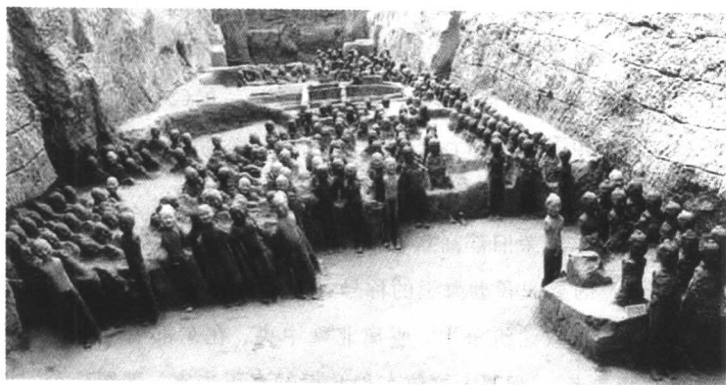
西汉《丞相御史律令》木牍

对一些重要政事，往往直接先与尚书商量，乃至任其起草文书，使之成为一种令人羡慕的“清要之职”。不久，尚书各曹，索性把外廷所管的民政、财政、人事、监察等具体事务接过来。各曹尚书由只管诏令文书的机构，变成实际处理政务的机构，后来就实质化地形成尚书台。^[1]至此，号称“天子副贰”的丞相之职形同虚设。甚至以种种借口，不经常设立了。

汉武帝又以亲信所担任的大将军，来接管丞相的兵权，并加上大司

马的称号，使之位于丞相之上。

然而，任何办实事的机构，哪怕是由皇帝所亲近的内朝官所构成的尚书系统，总要与外朝发生联系，管事日久，总会形成自己的独立性见解，皇帝还是不能放心。所以汉武帝在位时，就出现了与尚书系统相平行的机构，那就是中书令为首的中书系统。不过其初还是参用宦官来担任的，东汉后就专用士人了。乍看起来，中书系统紧随尚书系统而出现，简直是叠床架屋，多此一举。但有谁能知晓雄主汉武帝的一番苦心呢！



汉景帝阳陵从葬坑

总之，自汉武帝以来，尽管丞相的名号未曾取消，仍在行使其行政权，但实际上真正决定重大政事的，要末是以兵权为主导的大将军大司马；要末就是据有机要的尚书。有实权而又有丞相称号的大臣，只有在非常时期或有特殊功业，才会偶而出现。

权臣，就往往出自据有这些名位的人物之中。

西汉第一号权臣霍光，即以贵戚身份入官充任郎官，当上奉车都尉光禄大夫，侍奉汉武帝二十年，取得极大的信任，最后以大司马大将军之职，成为汉武帝的顾命大臣，开始他那声誉可与周公、阿衡（伊尹）相比的权臣生涯的。

后来篡位而当上新朝皇帝的王莽，也是以外戚关系，从黄门侍郎进

入内廷，也在骑都尉、光禄大夫、侍中这些内廷要职上耽过。最后代叔父王根为大司马，从而走过一段权臣的道路。

被外戚何进招引入朝的董卓，重视兵权，径自封为太尉，接着一下子成为“赞拜不名，入朝不趋，剑履上殿”的相国。相国这个名号，在汉代无比隆高，自萧何之后，就没有人担任过。董卓暴兴暴灭。他依仗兵权，先行废立，再据相位，以专杀为务，草略民财，很快就被诛灭。他所得的相位，就是属于有绝对权威的那种。

著名的曹操，最后位至魏王。他刚挟得汉献帝这个末世天子时，也是以“录尚书事”兼大将军来开始其“令诸侯”的权臣生涯的。^[2]平定北方之后，又登丞相位，同样“赞拜不名，入朝不趋，剑履上殿”，但始终没有加上相国这个特殊名号。建安二十一年(216)，曹操进爵为王，出警入跸，用天子的旌旗，戴着和天子一样的十二旒冕，妻称后，子称太子，离皇帝仅是一步之差了。

北魏末年，尔朱荣旧部高欢在混乱的政局中崛起，以武力军功取得“东道大行台”的要职和渤海王的称号，不久又取得大丞相的名号。后来，在与尔朱氏的政治纷争中，脱离北魏中央，在东部另立朝廷，成为东魏政权的缔造者。但是，这位东魏政权的真正主宰，不图帝位，不美王爵，甚至连大丞相之位也索性辞去了。这种只讲实力，不讲名位的情况，在众多的权臣中是不多见的。

南朝四代，所有的权臣都差不多以一个模式进阶：先由军功成为能开府的高品将军，然后以“录尚书事”把握政事，最后都进位到相国。

北周权臣杨坚，主要不是靠军功进位，而是在诡秘的政治活动中步步晋升。在他当上国丈之前，不过是一个普通的柱国，兼一个州的总管。周宣帝时，才任这位国丈为大柱国、大司马，还是不能真正地控制朝政。大定一年(580)，北周中枢发生变故，周宣帝不明不白地死去。杨坚的党羽内史上大夫郑译和御正大夫刘昉假传圣旨，才把他弄到执政的位置上去，成为大丞相，总领百官。到杨坚摆脱权臣的地位，一变而为隋朝开国皇帝的当口，北周给他的封号是：假黄钺、使持节、大丞

相、都督内外诸军事、上柱国、大冢宰、隋王。

无上的军权

军事力量是权力转移的催生婆。

激烈的权力转移固然是这样：

汉初刘氏皇族和功臣联合诛灭把持政权的诸吕，最关键的一着，就是周勃用“拥刘氏者左袒”的方式，掌握了当时京师地区的绝对军事力量北军；一代圣主李世民，从父兄手中夺过大唐政权，依仗的是玄武门前一场刀光剑影的殊死决战；以“节俭、平徭”而得到史家众口交誉的隋高祖文皇帝杨坚，则是以武力“大诛杀”而后得以建立他那短命的大隋王朝；以文定国的宋太祖赵匡胤，如果不是掌握了全国最精锐的禁军，恐怕难以在小小兵站陈桥驿“黄袍加身”；明燕王朱棣，罗致了燕北精兵，才敢于发动“靖难之役”，血洗中原，然后得以把侄儿朱允炆的皇冠，戴到自己的头上。



西汉武士

至于异姓天下的更迭，更无不是“龙战九野”，弄得个白骨千里，才达到“与民更始”，换了个新世界的。

权臣之所以成为权臣，也有一个权力转移的过程。

这种权力的转移，一般地说总是相对地比较平和。尽管如此，军事力量依然是这种转移的根本因素。当权臣在向最高权位靠拢时，不管是自觉，抑是不自觉的，最高军事指挥权的取得，几乎是与权臣地位的完成是同步的。



秦时调兵之虎符

带有外戚色彩的权臣，他们获得军权的方式最为平缓合法。

西汉的霍光和王莽，都是在权力上升的同时，被任命为大司马大将军，堂堂正正地由一个根本不懂军事的人，掌握了全国最高军权。北周的杨坚，基本上也是

是如此，只是在最后一步，趁周宣帝驾崩之机，稍为搞了些小阴谋，才得到“都督内外诸军事”的权力，从而当了一阵子权臣。

其余的权臣，其军权的取得，也都是步步渐进，至少是在为国效命的名义下，一刀一枪地晋升，最后总揽全国军权的。

东汉末年，在农民起义的打击和牵制下，原地方上的军事力量消耗甚剧，相反，中央在黄巾起义的刺激下，却兴起一股黠武的浪潮。被史家说得一无所能的汉灵帝刘宏是这场黠武浪潮中的活跃分子。他在这种尚武的气氛中，置立了西园八校尉，其中网罗了袁绍、曹操等英俊之士，由太监蹇硕为统领，又在城郊举行数万步兵骑兵相配合



西汉官印

的军事操演，自己顶盔披甲，亲临检阅，一切搞得像模像样。^[3]名义上掌握军事指挥权的大将军何进，才智平庸，为了向宦官争权，不惜借重只有三千机动兵力的边将董卓。董卓这位野心勃勃的陇西镇将，一进入京师，就利用当时的权力真空，自封为太尉；一面让陇西兵马晚出朝归，造成后备兵员不断充实的假象。然后逐次从丁原、张温等宿将手中夺取军事实力，最终全部掌握了东汉王朝的中央兵力。董卓就是依靠这些军事力量，抵御了关东各路“诸侯”的“义兵”，一度成为东汉